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重视党性教育

□高中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教育。早在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问题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而为了使党性教育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党中央把一大批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这为以后革命的大发展和全国解放做了干部准备。

重视党性教育

1940年10月28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干部政策与教育的干部第二号指示，其中提到提高干部的党性，加强党的锻炼与生活，军队中党员干部不仅应该成为好的军人，而且应成为好的党员。毛泽东赋予党校教育以统一思想的任务。他说考虑过去干部教育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同时，党员干部思想庞杂，思想和行动不统一，结果导致“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为凝聚人心，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的标尺是什么呢？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

对于学习理论与增强党性之间的关系。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演讲时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央在运动过程中又把学习理论与增强党性联系起来，要求“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当学习运动转入整风阶段后，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

干部党性教育的原则

1939年2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教育暂行计划》，全面负责全党干部学习教育工作。

一是针对不同干部的情况，对学习内容进行分类指导。党中央在《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将在职干部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级及中级老干部；第二类是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第三类是工作经验不够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级及下级知识分子新干部；第四类是在学术或技术上有较高造就的专门人材。解决这四类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根据上述原则，《决定》对四类在职干部学习的方向作了规定：第一类，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主，并从同自己有联系的某一方面学起，同时增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第二类，以学习文化首先以学习国文、数学、自然常识为主，同时增加政治常识与社会常识；第三类，以学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为主，并从同自己工作有联系的某一方面学起，同时增加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第四类，以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为主，同时增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四类干部均应研究时局动向与党的政策。

二是将本职工作内的学习与工作以外的学习统一起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还指出：在职干部学习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职工作以内的学习，一部分是本职工作以外的学习，其中，“第一种学习对在职干部是主要的，第二种学习是补助的，但是必须的”。本职工作内的学习，首先体现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因为无论哪一领导部门的工作，都必须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极大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同本部门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调查、研究工作，过去不是没有，便是很少；而这正是本部门工作的基本的与经常的部分，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即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基本方面。”工作以外的学习，应该包含文化（国文、史地、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政治（时事与策略）、理论（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三方面。这种学习对在职干部带补助的性质，其目的，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与理论的水平，使他们对革命，对工作更有信心与能力。”

三是使制度化的在职学习与集中式的整风运动紧密结合。为实现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化，党中央从1940年起，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确定为“学习节”，在这一天“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还要求“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后来又强调：“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此外，还规定了“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至1940年10月，“在教育制度上，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如：小组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

在中央党校，学员管理也要求体现出党性修养。如通过组织鉴定或者政治鉴定制度，来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效果如何呢？首先是让更多的领导、党员受到了世界观的教育。正如李维汉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其次，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邓小平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党性教育应有两个重点：提高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注重党性修养。他说：“党校是学习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程，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

1940年2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总结了办好党校的经验，作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关于党性修养的考察，“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为了巩固与发展党的事业，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指示规定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指示阐明了党校教学的中心目标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指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学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以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五天上课，一天党日）”。对于学员党性的考察，指示指出：“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指示还强调了党校“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地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式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用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把党的策略教育，即当前党的政策的教育，列为干部教育的正式教育的计划之中。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初步形成了党校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政治教育、业务教育、文化教育、党性教育等，而核心则是党性教育。党性教育的内容包括：科学精神、宗旨意识、知行统一、遵守党纪、联系群众。党性修养的方式包括：课堂讲授、实地调查研究、小组研讨、开展整风、参与生产劳动等。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干部教育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思想，规定高中级干部必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一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同时，会议决定：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

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宝贵的经验是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好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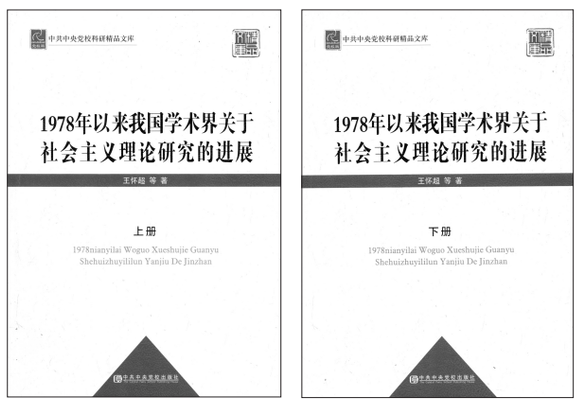
首先，党员的党性教育要以思想理论教育为基础。切实提高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切实掌握和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问题上求得彻底转变和提高。

其次，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每个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言论和行为。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系统的理论，工作能力亟待提高，但他们却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信仰，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不竭动力和继往开来的强大思想武器。

虽然今天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开展的党性教育，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集成之作



□罗宗毅

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王怀超主持撰写的《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一书日前出版了，这是理论界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1978年，我国开启了社会大变革的新时代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我国理论界围绕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行了大量扎实、具体的学术研究，推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介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提炼前沿问题、概括研究成果、总结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是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书尚不多见，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是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史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

翻阅这本书，令人感佩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收集资料的功夫；二是选择资料的眼光；三是整理资料的头脑。

首先，从收集资料这件事看，撰写这本书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费劲的力气活。全书85万字，集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涉及了广泛的理论问题，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历时八年有余才完成，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一本凝结了众多专家学者集体汗水的辛劳之作。一册在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流脉，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有哪些前沿问题，清楚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可以使读者用不多的时间，就能站到前人的肩膀上，鸟瞰学术界研究的整体概貌，了解各种不同观点及其根据，以便选择在哪些方面深入探索下去，免去了从头开始、大海捞针式的查阅资料的工作。

其次，从资料选择的角度看，该书资料收集的面非常之广，既有来自权威的名刊名作，也有来自非权威性刊物和名不见经传者的著作文章，只要观点新颖、有含金量、有代表性，就被收入进来予以介绍。这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没有鉴别良莠的慧眼，是难以发现那些立论各异的著作文章所蕴含的学术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又是一本体现主编和专家学者水平的智慧之作。

最后，为了更好地反映理论界的研究进展，该书采取了点、线、面结合的述评方式。所谓“点”，就是对理论界在讨论中形成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做客观准确的概要列举；所谓“面”，就是围绕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重大问题按专题划分作分类介绍；所谓“线”，就是阐述基本理论、重要思想、重要观点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应当说，该书以1978年为起点，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展状况作了很好的描述，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很好的分类梳理，对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作了很好的概括。从一横一纵两个维度，竖串横比、史论结合，既有问题意识导向，又有学术框架统领，是一本全面归纳概括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及其演进过程的集成之作。

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在内容上不单是紧扣基本理论和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等问题进行深度讨论，还特别关注到了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和薄弱点，专设了“研究趋势”“简短评论”来提示理论研究发展的走向，不仅有对历史和现状的观照，还以超前的意识引领未来，显示出作者的理论功底和前瞻的眼光。我想，从读者的角度看，一部分人希望通过阅读此书“直接站在前人的肩上”，以便在新的起点上出发上路；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发现现有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找到“另起炉灶，独辟蹊径”应当集中发力的突破点。我以为，这本书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类读者的需求，既是一本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成果汇聚，还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科研指南”。

世界如何改变与如何改变世界是两个紧密关联的命题。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不能不说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贡献息息相关。30多年过后的今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历史的今天，我们有理由说，《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一书，不仅为过去30多年来学术界的理论探索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更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我们衷心地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

书评

云 趣

□杨文礼

水蒸气遇冷凝结成为微小的水点成团地空中漂浮叫云。

云是一种自然景观。有人讲，春云飘逸而又神秘变幻，夏云泼辣而又热情奔放，秋云温润而又凝重内敛，冬云深沉而又从容淡定。无论春夏秋冬，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云，我都喜欢观看。

西安能看云的日子并不多，可家乡几乎天天有云看。在家乡印象中，云是不可缺少的元素：红日，蓝天，白云；金土地，青纱帐，绿森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站在川道、山沟里看，云像是在眷恋着的山峁、山梁上谈情说爱，若是等上暴风雨来临，黄云推磨，黑云翻滚，好像能把山峁、山梁融化和吞噬掉；站在山峁上看，云在碧净如洗的天上浮幻着，白云苍狗，皇天厚土，使得人灵魂似风，岁月如歌。

我曾站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真正体验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草原的胸怀博大辽阔，一片片的白色，不是在湛蓝深邃的穹庐上飘荡，就是在碧草无边的绿海上滚动，听着悠扬浑厚的长调和如泣如诉的小曲，你的心能不痴醉在这杂花点缀的草原！

我曾乘汽车去朝觐西藏第一大湖那木措，翻过海拔5192米的当拉山口（当拉山主峰7117米），到了藏北那曲草原，最强烈的感觉是：在刺眼的晴空中，形状多变的云朵云层，沉重地、浓厚地紧压在四周的山顶上，也压在自己的胸膛上，沉重的气都难喘。脚下的地平线都已遥遥地高出海平面五千多米，但念青唐古拉山脉一般都很平缓，绝对高度一二百米，被云一压，使人更感到青藏高原的高峻、云的厚重、天的低矮，奇特印象深深铭刻脑海。

我坐飞机爱靠舷窗，当飞机跃上万米高空，看云层云海，万千形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诱发人无限遐想。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飞回西安，俯瞰云涛云海，苍莽大地，一时诗兴大发，诌了一首《鸟瞰大西北》：“跃上苍穹众峰微，目收万里一杆棋。山起皮皱水游丝，云积棉垛天胜洗。曾经西北识博大，除却瀚漠无雄奇。天地一块杂色布，剪裁待人用心机。”我仅上过一次峨眉山，云山雾海，腾云驾雾，处身云中，绝佳景致反倒浑然不见，虽颇多遗憾，却别有情趣。

云是文人笔下描写的对象。相传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卿云歌》：“卿云烂兮，虹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灿烂如霞，瑞气缭绕呈祥，日月光华照耀，辉煌而又夺目，可以说是对云的最早赞美，也为复旦大学提供了最富有诗意的校名。谢眺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观察细微，比喻生动。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震当时，流传千古；李白“天与水远，云连山长”“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生”“朔云横天高，万里起秋色”，杜甫“江云飘素练，石壁断空青”，想象奇特，气韵高深；“舒卷意何穷，萦流复带空。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这是皎然描写溪云的诗句，轻逸空灵；“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如兽出山前，细雨和风满渭川”，这是李贺和韦庄摹状雨云的名句，情景交融；“尽日看云首不回，无心都大似无才；可怜光彩一片玉，万里晴天何处来”，杜牧对造化的提问，充满哲理；“须臾黑云如泼墨，欲雨不雨不可得，须臾云开见落日，忽展一机云锦出。一态未了一态生，愈变愈奇人莫测”，戴复古借云抒发对世事的感慨，发人深省。古人对云的描述，与云同样耐人琢磨和寻味，真是风起云生，云蒸霞蔚，多姿多彩，美轮美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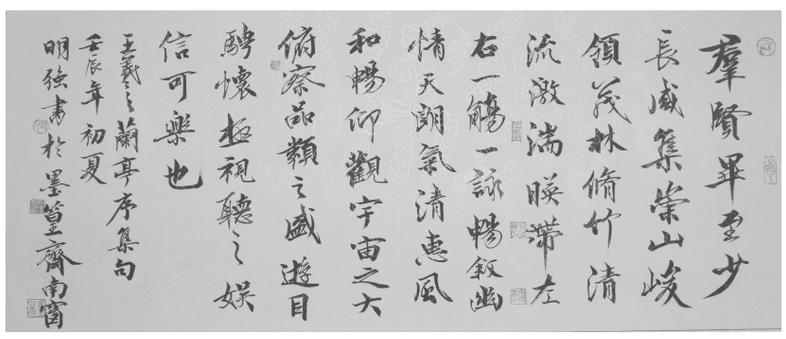
天地运行，万物变化是有其常道的（也就是有其规律），“道”反映于万事万物中。望天观云，察颜观色，人们从中认识和学习着生存智慧。爱云看云显现着人的一种心态：皎然的“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苏轼的“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陆游的“晴空万里宽多少，一片闲云足卷舒”，都是一种闲淡平和的心态，心平气静，元气和顺，调心养性，强身健体。爱云看云表明一种人生态度：正如明代张英的诗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豁达洒脱，顺其自然，“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爱云看云可以学得方法论：善于观察事物变化，就会用变化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不会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思想对人对事。爱云看云可以坚定我们唯物主义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发展变化的因果联系的统一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对我们来说，也必须认识、遵循这种规律，才有望取得成功。

云生云灭，笑傲世局兴衰成败，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云卷云舒，直面人生沉浮得失，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傲寒开。人须低头看路，更应抬头观天。

好心情，去看云；心情好，看云去。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

随笔



书法 邱明强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

师生才艺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